

伊斯兰教与埃及现代化悖论

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10)

摘要: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埃及在殖民和反殖民斗争中经历了三波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 最终埃及工业化失败, 拖累埃及社会现代化, 两极分化严重。但20世纪埃及现代化之成败, 与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关系。从国内看, 主要在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权的残酷剥削, 背离了伊斯兰教的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思想。从埃及的经验看, 倘若伊斯兰国家执政者真正践行伊斯兰教“爱人”的使命, 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增强国家威望和政府效力, 大力推进工业化和社会结构合理化, 伊斯兰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和穆斯林的普遍福利。

关键词: 伊斯兰教; 现代化; 埃及

中图分类号: D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2018)05-0101-06

伊斯兰教的发展是早期形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 伊斯兰教建制化的完成又是伊斯兰教开始酝酿变革的时候。1400多年以来, 伊斯兰教自身的变革, 已然形成强大的传统。然而, 伊斯兰教多次重大变革, 并未导致伊斯兰教从教义(神学)或教俗(国家与宗教)关系层面进行更新, 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复杂局面, 使人们对于伊斯兰教与现代化这个宏大命题至今兴趣盎然。鉴于伊斯兰教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伊斯兰国家教俗关系及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特别是欧美国家穆斯林对现代化的适应, 仅仅从哲学层面讨论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关系, 显然是不够的。本文拟在简要梳理伊斯兰教独特性基础上, 从实践层面考察伊斯兰教与埃及现代化互动进程, 这对于深化人们对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的认识或许有所裨益。

一、三维视野下伊斯兰教的独特性

宗教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 是大自然和错综

复杂的人类社会在人的意识中曲折、颠倒的反映。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诞生, 对于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社会进步, 对于广袤的亚非文明核心地区的发展, 历史上曾经起到积极作用。就精神层面而言, 宗教关乎人的价值追求, 人对彼岸的摸索与追寻, 亦即“神与人”关系。

伊斯兰教作为彻底的一神教, 认主独一是其根本信仰。真主乃宇宙第一动力, 世界万物的创造者, 因此真主之外的一切存在都是次生的、次要的, 人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笃信真主、效命真主。这种唯心主义本体论, 与基督教并无根本差别, 但是由真主本体论推导出真主主权并且从教义特别是从法理和政治层面坚守至今, 则是伊斯兰教的独特性。既然真主创造万物, 世间的一切包括国家或人类共同体, 宇宙万物的所有权和国家主权, 均归于真主。真主主权论必然的逻辑结果, 就是立法权、统治权乃至司法权归于真主, 伊斯兰国家成为真主法度之国。所谓的法治, 如霍梅尼反复、循环论证的法治, 指的是尊奉、实施真

收稿日期: 2018-09-01

作者简介: 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秘书长。

主之法。然而，事实上飘渺在人的视野与能力之外的真主主权、真主之法，最终还得回到人们肉眼可见、双手可以触摸的现实世界。既然真主创造人，本旨在于人的两世吉庆与两世福乐，那么，人在此岸的幸福安康，就是伊斯兰教的重大使命。

中国伊斯兰协会把伊斯兰教核心价值观归宗于敬主爱人，短短四个字，抓住了伊斯兰教的真谛。敬主，是伊斯兰教之根本，最简约最易懂的表述就是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区别，就在于穆斯林终生一以贯之、毫不动摇地笃信清真言。在笃信真主，亦即敬主的前提下，回到凡世“爱人”，逻辑上属于次生或派生，但正是敬主的逻辑结果和实践过程。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穆斯林的生活目标，践行真主教导——爱人，就是笃信的结果与强化。真主不是喜悦人的和谐、幸福与美满吗？真主不是喜悦真、善、美么？正如明清以来中国穆斯林先贤所指出，伊斯兰教之爱人，与中国儒家之“仁”，本旨上一致，实践上相通，结果上趋同，正所谓殊途同归。这也正是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融入中国主流文化，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们从“神与人”关系转到伊斯兰教“恒与新”关系。

“恒”者，认主独一，也就是敬主，笃信清真言。对于穆斯林而言，这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唯一价值与绝对信仰。“新”者，变革、创新，就是穆斯林在凡世为了更好地践行真主使命，需要从认识论与社会实践层面，开拓创新。真主创造万物和人类，真主前定之信仰，并不排除人的自由与理性，“真主依照人的自由而使他的行为成为必有的，或必无的，这足以证实人有自由，而不足以反对人有自由”^①。人的自由与理性皆为真主前定，因而是相对的，但是人的自由、理性及认识事物的过程，是真主所喜悦的，因此先知穆罕默德留下圣训：“求知虽远，不怕远去中国。”伊斯兰教鼓励人们学习知识，追求真理，大胆实践，今生幸福。

对于穆斯林而言，人的理性是必要的，虽然与天启相比理性是次要的，但是人的理性与信仰都是接近真主、认识真主的工具。就伊斯兰教传播与发展而

言，恰恰是经由理性之光，伊斯兰教信仰与制度、教义与教法得以完善，这本身就是持续了数百年的创新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这样的事例，在伊斯兰教历史上不甚枚举，比如10世纪创制的大门关闭以后，伊本·泰米叶（1058—1111年）将苏菲主义的某些成分融入到正统信仰，以及近代以来调和信仰与理性、科学与宗教的种种尝试。总之，吸纳其他宗教和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有益养分，变革创新，是贯穿1400余年伊斯兰教历史的宏大话题。如果没有“百年翻译运动”，没有借鉴和吸纳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无论伊斯兰教建制化还是教义与教法发展与完善，必然是人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另一条路径与迥然不同的结果。伊斯兰教的变革与创新，是贯穿伊斯兰教千余年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接下来谈谈伊斯兰教“一与多”关系。

伊斯兰教是一个宗教，统一的宗教。因此，这个“一”，首先是统一。“一”是伊斯兰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本质规定与根本属性。伊斯兰教的根本信仰——“一”，真主独一。不管伊斯兰教教义如何复杂深奥，教派怎样众多繁复，其根一也，就是清真言。只要笃信和践行清真言，认主独一，就是穆斯林。然而，正如一棵苍天大树不能只有“根”，只有“根”不为树，树根与参天大树是一体的；树根支撑大树，为大树提供必需的养分；大树是树根的延伸、发展及其意义所在；树根与大树共存共荣，不可分割。这里，我们所说的“一”，就是“根”，或可比喻为树根。无根没有树，无树何来根。中国伊协提出的敬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就是伊斯兰教的“根”。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历史现象，宗教的传播和发展，就如同树根长出树干、树枝和树叶，逐渐从“一”走向“多”。先知穆罕默德早期的追随者，迁士与辅士，不是从一种类型的穆斯林追随者变成了两种吗？可以说，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与拓展，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一”（朴素的早期形态的伊斯兰教）向复杂多元的伊斯兰教演变的过程。这个“多”，包括教义发展和教派分化，既是伊斯兰教发展的必然过程，更是伊斯兰教融入本土文化的历史进程。璀璨的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教长期互动与融合，

^①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

伊朗的伊斯兰化与伊斯兰的伊朗化相互促进,使伊朗最终成为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悠久的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的碰撞交融,使中国伊斯兰教绝然有别于西非伊斯兰教。因此,“多”是必然的,“多”是常态,“多”是“一”的表现形式和派生物,但是“多”并没有否定“一”。

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是敬主爱人。敬主,笃信独一全能的真主,只是穆斯林功课的前半部分。回到此岸,穆斯林的功课就是爱人,诚如先知穆罕默德训示:“穆民皆兄弟。”唯有在发展中提高所有人民的福祉,才能践行爱人的使命与义务。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生产力飞跃发展,人们普遍地更加重视此岸的物质福利。伊斯兰世界落后了,政教一体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土崩瓦解,伊斯兰世界瓜分豆剖,分割为弱小的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准独立国家,如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前述所谓伊斯兰教的“多”,进而固化为伊斯兰国家的“多”。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原本具有各自不同文化底蕴的“多”个伊斯兰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亦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这里以埃及为个案,从实践层面具体考察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

二、埃及现代化及其困境

尼罗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埃及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和最重要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7世纪40年代,阿拉伯人入居埃及,经过二三百年的移民、通婚与融合,到10世纪初埃及先后完成了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成为阿拉伯国家。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即中国史籍之绿衣大食)时期,埃及人崇信什叶派,发展成为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三大中心之一,与两河流域的巴格达、伊比利亚半岛的科尔多瓦并驾齐驱。始建于972年的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千百年来像磁铁一样吸引伊斯兰世界的学子游僧,从文化和宗教上奠定埃及的伊斯兰教核心地位。埃及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和伊斯兰教核心地位,19世纪初以来成为埃及坎坷曲折的现代化进程的底色。

(一) 埃及现代化轨迹

埃及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在1798年遭到

法国入侵而被强行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拿破仑入侵激发了埃及人的民族独立与革新图强意识,在驱逐法国侵略军中崛起的阿尔巴尼亚籍军官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1805年出任埃及总督,实际执掌埃及国政,启动埃及现代化进程。1811年,他在开罗的萨拉丁城堡设鸿门宴,诛杀埃及封建势力——马穆鲁克。^①阿里虽然表面上臣服奥斯曼帝国,却梦想以埃及为中心,建立强大的穆斯林帝国。为此,他大量垦殖土地,引进长绒棉,进行土地改革;聘请西方技师,引进欧洲先进的机器设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其中以开罗城堡兵工厂和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最大;发展纺织业和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民用工业;向法国等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建设强大的军队,陆军23万人,海军1.5万人,军舰32艘。然而,阿里引领的埃及现代化直接冲击了奥斯曼帝国,并且妨碍了英法殖民扩张,因而遭到强行封杀。阿里梦想破灭,郁郁寡欢,晚年精神错乱,1849年病故。

1840年《伦敦条约》扼杀埃及短暂的第一波现代化后,19世纪50—70年代埃及在英法的渗透中努力实现自由经济和门户开放,借助于欧洲的资本恢复近代机器工业,建设铁路、敷设电报和电话线,开凿苏伊士运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打断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举债式发展的“欧化”道路,导致1876年埃及宣布财政破产。1882年英国公然入侵埃及,再次打断埃及的第二波现代化进程。

1882年埃及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成为英国纺织业棉花供应基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工业发展遭到英国公开压制。英国殖民当局宣称,埃及缺乏燃料、资金和技术,不宜发展工业,强行关闭工厂。通过低关税,埃及市场门户洞开。英国逼迫大力发展棉花种植,导致经济单一化,埃及在世界市场上的低端位置始于此。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52年“七月革命”,埃及现代化环境略有改善,工业化艰难推进,埃及现代化进程进入第三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外贸受阻,国内市场得到保护,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英军大量进驻埃及,需要物资和后勤保障,扩大了市场的有效需求。由于英国全力应对世界大战,需要埃

^① 杨灏城、许林根:《列国志·埃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及的资源与支持,不得不放松对埃及的政治控制。大战也刺激了埃及人的工业意识,民族工业环境也逐渐改善。埃及开办工业学校和工业银行,修订关税制度。1930年埃及终于获得关税自主权,开始利用关税保护民族工业。1937年废除外国人在埃及的特权,埃及民族资本可以与外国资本平等竞争,埃及政府在税收政策上获得自由。二战结束后,埃及民族工业发展继续得到推动。1947—1952年埃及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率,从36.6%上升到46.1%,同期工业投资额从3590万镑增加到6150万镑。^①

这三波时断时续的埃及现代化进程,都是在外来侵略势力的强力干预下中断或艰难推进的,成效极为有限。1952年埃及开始走向真正的独立时,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达31%,工业占的比率仅9%。1954年阿卜杜·纳赛尔执政,高举社会公正的大旗,倡导融合阶级差别,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和工业化推进埃及现代化进程。1959—1975年间,埃及采矿业和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5.9%,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4.8%的增长速度。工业结构逐渐升级,在工业增加值中,基本消费品工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64.8%下降到1966年的55.6%,化工、纸张、金属等中间产品比重的增加引人注目,机器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52年的0.7%上升到1966年的4.4%,^②埃及正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准工业国迈进。然而,1970年安瓦尔·萨达特执政以来,实行“开放政策”,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埃及工业化不进反退,埃及经济沦入地租性经济的泥沼,依赖受制于国际市场波动冲击的侨汇、石油出口、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

萨达特执政以来的四十年间,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在埃及遭遇重挫。制造业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早在1959—1975年间已从17.5%上升到20.5%。然而,自萨达特开启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这个比率一直在20%上下波动,2016年更下降到15.8%。^③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直

到2012—2013年埃及农业部门生产率仅为埃及国内平均生产率的一半。比较埃及与土耳其20世纪后半期的工业化,清晰地证明埃及工业化的失败。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工业能力和出口结构大同小异,1977年工业品出口占两国出口总额的25%。2003年,工业品出口占土耳其总出口额的85%,而埃及仅占39%。^④

四十多年来埃及工业化的倒退,是埃及现代化陷入困境的集中体现。

(二) 从社会结构审视埃及现代化困境

工业化既是现代化的核心,又是现代化最强劲的动力。埃及工业化的失败,必然拖累埃及的社会现代化。下面从社会结构角度,揭示埃及现代化的受挫与发展困境。

纳赛尔时期(1954—1970年)的埃及,虽然在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上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限制地租和房租、实行义务与免费教育、普遍发展社会福利等,不过埃及刚刚摆脱封建剥削和半殖民压迫,处于一穷二白的贫穷状态。埃及的社会结构,从上层、中层和下层分别占2%、5%和93%,演变为上层与中下层分别占20%、80%的二元结构,社会鸿沟有所缩小。令人惊讶的是,1970年萨达特执政以来的四十年间,埃及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明显优化。

依据公开统计数据 and 埃及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社会结构进行五分法分析。(1)顶层约占人口1%,由行政事业单位、军方、国企享有决策权、掌握资源的上层管理人员,大资本家和新型地主(农业资本家)组成。(2)中上层占总人口的10%,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占地10—50费丹(1费丹约合6.3市亩)的土地所有者和中等资本家上层。他们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直接受益群体,处于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中。同时,中上层成员之间联系密切,存在广泛的水平流动。(3)中间层占埃及人

① [埃及]穆罕默德·拉什迪:《埃及的经济发展》第2卷,开罗:埃及知识书社,1972年,第186页。

② 毕健康、陈勇:《当代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问题评析》,《西亚非洲》2017年第6期,第11—12页。

③ Khalid Ikram, *The Egyptian Economy, 1952-2000: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Issue*, p. 88. Central Bank of Egypt, *Annual Report 2015/2016*, p. 117.

④ Amr Adly, *Stat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Turkey and Egypt in the Post-Liberalization E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4.

口的19%，主要由行政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中等资本家的下层、占地5—10费丹的土地所有者、石油劳工和自由职业者组成。(4)中下层占30%，处于向下流动的险境，主要由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小业主和占地1—5费丹土地所有者组成，约占总人口的30%。(5)底层占人口的近40%，亦即食不果腹的贫困人口，处于社会底层，主要包括私人企业的工人、占地1费丹以下的贫农、少地或无地的农业工人和城乡失业人员。

埃及社会贫困化程度高，所谓的中下层，实际上可视为相对贫困人口。因此，埃及社会结构实际上变化不大，也就是回到二元结构：下层由中下层和底层组成，占人口的比率高达70%；中上层包括中间层、中上层和顶层，仅占人口的30%。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中间层规模太小，仅占埃及总人口的19%。按照社会学理论和西方现代化实践，现代社会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占比不能低于40%，西方发达国家占比在50%至80%之间。假如埃及中间层占比从19%提升到40%，那么中下层及部分底层人口就可以跃升到中间层，社会结构就基本合理，也即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

埃及的现代化进程，于是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之中。一方面，工业化的失败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裹足不前，优质就业岗位少，不能推动社会结构合理化和现代化，两极分化严重。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布局，反过来制约工业化。占人口70%的下层，收入极低，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制约埃及国内市场的扩大。下层人口没有储蓄能力，影响埃及国内资本积累与投资能力，因此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拖累埃及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如果埃及中间层扩大到40%以上，那么，埃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将在消费(国内市场拉动)和投资(供给侧)方面得到强有力地推动。

三、敬主爱人，推进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

埃及是一个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宗教是各个时代埃及民族性和埃及文明的核心因素。埃及人多次改宗，从法老时代的太阳神崇拜，到基督教，再到伊斯兰教，信仰的宗教改变了，信教的传统却绵延

至今。然而，就国家与宗教关系而言，埃及宗教却不是凌驾于国家世俗政治之上的高高在上的力量。虽然伊斯兰教在动员民众抵抗拿破仑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主政并启动埃及现代化的是军功起家的穆罕默德·阿里。纵观埃及19世纪命途多舛的现代化历程，不是埃及保守的宗教势力抵制或阻碍埃及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改革，而是欧洲列强强行扼杀穆罕默德·阿里改革，1882年以来英国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赤裸裸地扼杀埃及民族工业。1923年宪法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奉行乌玛主权和自由主义原则，创制出君主统而又治的国王主导型政治权力结构，伊斯兰教处于政治权力边缘。因此，20世纪埃及现代化之成败，与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关系。

然而，伊斯兰教力量作为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的次要方面，也不是全然可以忽视的。在英国的半殖民统治下，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逐渐发展，1923—1952年间在埃及混乱的民主政治进程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王室、英国殖民势力与华夫脱党的三方博弈中游刃有余。自由军官组织亦曾与穆斯林兄弟会接触，借助兄弟会力量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统治。1952年“七月革命”后，兄弟会居功自傲，总训导师哈桑·胡戴比会见纳赛尔，提出两项要求：其一，进行土地改革时，将地主占地最高限额从200费丹提高到500费丹；其二，政府在决策前必须把决议提交兄弟会领导机构审议。^①兄弟会的嚣张，由此可见一斑。1954年和1965年，纳赛尔两次严厉镇压兄弟会。萨达特当政以后，借助兄弟会力量打击左翼和纳赛尔派，释放兄弟会成员。到穆巴拉克时期，兄弟会处于半合法状态，从1984年开始兄弟会成员多次参加人民议会选举。穆巴拉克既为兄弟会留下一定的政治空间，在不威胁政权的前提下允许兄弟会参政，但是绝不允许兄弟会合法化，更不允许兄弟会建立自己的政党。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突然垮台，兄弟会在埃及“民主政治”游戏中坐大，直到穆罕默德·穆尔西2012年当选埃及总统。

由此可见，自兄弟会成立90年来，穆斯林兄弟会经历了由小到大，从隐到显，直至登上埃及总统宝座的漫长过程。由此我们提出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

^①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32页。

(1) 埃及伊斯兰教力量,具体地说就是兄弟会制约埃及现代化进程?(2) 或者反过来问,埃及现代化受挫为兄弟会壮大提供了肥沃土壤?纵观百年来埃及的现代化与政教关系,有两条极为清晰的红线。其一,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民间伊斯兰,或遭到铁拳镇压,处于政治权力边缘,对于埃及政权起到的制约作用相当有限。因此,埃及现代化的失败,主体责任当然不在兄弟会。其二,以宗教事务部和爱资哈尔系统为代表的官方宗教系统(官方伊斯兰),隶属于政府,在人事任免和财政上受政府节制,为当局提供合法性,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总统均利用宗教巩固自己的统治。

埃及现代化受挫,埃及两极分化长期得不到根本缓解,埃及社会结构的优化裹足不前,为以兄弟会为代表的民间伊斯兰势力发展创造了条件。首先,埃及工业化的失败,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失去动力,人们的世界观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人的价值观停留在传统农牧业社会。没有工业化的洗礼,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人们的宗教观便依然停留在过去。兄弟会的宣教,就可以在中下层民众的心中引起共鸣。其次,正是由于高达70%的埃及人口挣扎在生存线边缘,兄弟会倡导社会平等与公平公正深得民心,更重要的是,兄弟会长期以来构建的多层次、广覆盖、有效率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体系,更加夯实了兄弟会的社会基础,因而在票决游戏中兄弟会轻易击败世俗派。因此,问题的焦点不在于世俗与宗教之争,而是民众现实的苦难反过来加强了兄弟会的政治实力。

从遥远的彼岸回到现实的此岸,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至少就埃及现代化进程而言,不是伊斯兰教妨碍了埃及的现代化。伊斯兰教的本旨“敬主”,必然要求“爱人”。爱人的最低准则,是杜绝腐败。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治清明,纳赛尔虽然犯过重大过错,但一心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深得埃及人民的爱戴。萨达特总统虽出身寒微,却逐渐滑向奢靡,穆巴拉克总统家族的腐败则如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此其一。其二,伊斯兰教重视社会平等和公平正义,主张富人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因此,伊

斯兰教的平等思想与现代社会追求均衡合理的社会结构、着力扩大中间阶层殊途同归。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权背离《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绝大多数人口受到残酷剥削,深陷贫困泥沼不能自拔。因此,埃及执政当局必须牢记和践行伊斯兰教穆民平等、社会公正的本旨。其三,无论就“爱人”抑或现代化要求的人力资源发展而言,从国民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必需着力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努力构建均衡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从而釜底抽薪,从本源上杜绝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与运动。这样,塞西总统提倡的“更新伊斯兰话语”才会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其四,挖掘伊斯兰教强大的开放与创新传统,拥抱现代化。没有对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开放、吸纳、融合与创新,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辉煌文明就失去源头活水。面对西方侵略和渗透,埃及宗教及知识精英,比如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年),敞开胸怀,以大无畏的勇毅和强大的创新精神,融通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为现代化开辟思想通道。

伊斯兰教以神(真主)为根,以人为本,固根护本,根本一也。认主独一,真主前定,人更有自由意志和追求今生福祉的权利。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发扬理性,求知探索。信仰是真主启示的真理,科学是真主创造的真理,均源自真主,并行不悖。从这种认识论出发,发展科学,追求真理,认识自然,改造世界,便是穆斯林特别是执政者的普遍义务。埃及现代化遭遇挫折,并非真主前定,更非敬主使然。恰恰相反,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埃及执政者把伊斯兰教“爱人”的本旨,把《古兰经》、《圣训》关于爱民如子、穆民平等、公正自由、仁政德治的教导置诸脑后,贪图个人奢靡享受,痴迷于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倘若伊斯兰国家执政者真正践行伊斯兰教“爱人”的使命,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从思想解放和话语更新、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入手,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增强国家威望和政府效力,大力推进工业化和社会结构合理化,那么,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或穆斯林的普遍福利,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此,则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责任编辑:杨东